

建构中国自主的档案学知识体系

张 斌 杨 文

摘 要 中国自主的档案学知识体系主要是指中国人立足中国实际自主建设的具有原创性、确定性、系统性的档案学认识和经验系统。建构中国自主的档案学知识体系不仅是繁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任务,而且是继承、反思、创新中国档案学思想和理论的必由之路。从中国档案学史来看,自档案学创立,经过近百年的探索发展,基于自发性研究、计划性研究、组织性研究,历经肇始、形成发展、自主建构三个阶段,逐步建立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知识体系及其叙事传统。面对新征程建构中国自主的档案学知识体系的任务与挑战,亟需观照时代发展,形成自主建构档案学知识体系的自觉;坚持以我为主,形成独立自主和开放包容的建构之路;扎根中国大地,努力构建原创性的档案学概念和理论;解决中国问题,推动以人民为中心的档案学知识创新;彰显中国之理,解决国际档案学研究面临的共性问题。参考文献 50。

关键词 档案学 中国特色 知识体系 知识创新

分类号 G270

Constructing the Autonomous Archival Science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a

ZHANG Bin & YANG Wen

ABSTRACT

The autonomous archival science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a mainly refers to the original, definitive and systematic system archival understanding and experience built by Chinese people independently based on Chinese reality.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utonomous archival science knowledge system in China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task to prosper th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ut also a necessary way to inherit, reflect on, and innovate the ideas and theories of Chinese archival sci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rchival science, since the archival science has gradually established the archival science knowledg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narrative tradition based on spontaneous research, planned research, and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through three stages of initiation,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independent construction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nearly a century ago. 1) The modern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ese archival science began to be constructed along with the beginning of archival science research in the 1920s and 1930s.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stablishing the archival science as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became an important task, and the knowledge system of what, why and how archives, archival science, archival work, archival education and archival career were respectively established, forming an archival science knowledge system with empirical science as its main feature. 2) After 1978, archival science has systematically

通信作者:杨文,Email:yangwen28@ruc.edu.cn,ORCID:0000-0002-7459-4134(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dressed to YANG Wen,Email:yangwen28@ruc.edu.cn,ORCID:0000-0002-7459-4134)

moved from empirical science to theoretical science, developed into a group structural science with a series of sub-disciplines, established a discipline system and knowledge system with theoretical archival science, applied archival science and technical archival science as the main subjects. The archival science knowledge meets the needs of Chinese archival practice, concerned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the times, and has realiz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rchival science knowledge system from singularity and fragmentation to systematization and scale. 3)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the independent construction of the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ese archival science has achieved consensus at both the conceptual and operational levels; the archival science knowledge system and its narrative system reflecting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ese solutions and Chinese wisdom have been established at the core.

Faced with the task and challenge of constructing the autonomous archival science knowledge system in China, it is urgent to observ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form a consciousness of constructing an archival science knowledge system independently, adhere to the self-centered approach, form an independent and open construction path, take root in Chinese soil, strive to establish original archival concepts and theories, solve Chinese problems, promote people-centered archival science knowledge innovation, and manifest Chinese reasoning. We will also address the common problems faced by international archival research. 50 refs.

KEY WORDS

Archival scienc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nowledge system. Knowledge innovation.

0 引言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继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之后,进一步对繁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作出的科学判断和提出的重大任务,深刻揭示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基础与核心支撑。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的启航,着力提高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责任、构建意识和构建能力,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理论和方法创新,从而更好地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不仅是时代的召唤,而且是历史的必然。纵观历史,古今中外人类社会的每一次重大跃进和人类文明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新理念、新思想、新认识、新战略、新技术等因素的推动与影响,都在很大

程度上受益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理念变革、知识更新、思想先导。

中国档案学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代表学科,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至今,经过近百年的探索、建设与发展,已经成为全世界档案学的重镇,在国际档案界独树一帜并具有重要影响力。作为一门生长于中国大地并倾力服务国家治理的学科,中国档案学服务和支持的是一项全面践行存史资政育人使命的利国利民、惠及千秋万代的崇高事业——中国档案事业,与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民族复兴等密切相关。建构中国自主的档案学知识体系,提高档案学知识生产的主动性、自主性、本土化,进一步创新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思想、知识、理论、方法,提升中国档案学的国际地位和社会美誉度,不仅是发展和繁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任务,而且是推动中国档案学实现继承、反思、创新的必由之路,这是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赋予中国档案学人的崇高使命。

从学界既有研究成果来看,中国自主的档

案学知识体系是一个严肃的学术话题,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研究伴随着中国档案学整个建设和发展过程。在微观层面,主要以近现代档案学词源考证^[1]和来源考察^[2]为起点,较为系统地探讨我国档案学^[3]、历史档案学^[4]、文献编纂学^[5]、科技档案管理学^[6]、档案保护技术学^[7,8]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科建设过程与理论发展,并基于信息技术发展、数字人文研究、新文科建设、国家战略布局等探讨档案学分支学科及其相关理论的建构,如数字记忆^[9]、计算档案学^[10]、档案学交叉学科^[11,12]、档案学科发展前景^[13,14]等。在宏观层面,从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档案学科创建起,以吴宝康为代表的学者就提出了档案学建设话题^[15],并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逐渐系统性延伸到探讨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建设问题^[16],如冯子直^[17]、王德俊^[18]等专门撰文呼吁要建设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体系,最终形成了由理论档案学、应用档案学、技术档案学构成的档案学学科体系,同时形成了由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构成的档案学理论体系^[19],并初步探讨了中国档案学在学术研究层面所形成的人文、管理、技术取向^[20],以及档案学理论“中国特色”为何和何为^[21]等问题。在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之后,学界围绕党和国家“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决策部署,专题研究档案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论题,聚焦打造新时代中国档案学派^[22]和提升档案学学科竞争力^[23],较为全面地探讨了中国档案学发展脉络^[24]、中国特色档案学基础理论体系的历史发展与当代构建^[25],并重点对档案学学术体系^[26]、学科体系^[27]、话语体系^[28,29]的建构方法与路径进行了研究,初步建立了档案学“三大体系”的概念和理论框架。这些研究成果对中国档案学的逻辑起点、学科使命、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等进行了基本梳理,体现了我国档案学界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档案学的责任与担当,为建构中国自主的档案学知识体系提供了文献基础和理论积淀。然而,既有成果距建构中国自主的档

案学知识体系的目标还有一定的距离,缺少对中国自主的档案学知识体系建构的专题研究,尚未直接回答中国自主的档案学知识体系建构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这为本文留下了进一步研究和探索的空间。

1 把握建构中国自主的档案学知识体系的历史机遇

1.1 中国自主的档案学知识体系的内涵

建构中国自主的档案学知识体系,首先需对这一概念进行定义。作为一个新概念,学界对此尚处于研究讨论之中。在2022年教育部高等学校档案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年会上,冯惠玲教授在致辞中提出中国档案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以中国档案学者、档案工作者为主体建构的能解决中国问题的档案知识体系”^[30]。该论述从建构主体、建构目的等层面对中国档案学自主知识体系进行了解释。事实上,从中国自主的档案学知识体系概念的结构来看,它是一个包含了中国、档案学、自主的、知识、知识体系等子概念的复合概念。其中,“中国”强调知识的生产主体与知识产权归属于中国。“档案学”是一门定义清晰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界已形成共识,此处不再赘述。“自主的”旨在强调中国人对于档案学知识体系建构的自觉性、主动性、民族性、本土化、原创性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那样,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31]。该论述表明“自主的”必须包括“中国的”“中国实际”“主体性”“自主性”“原创的”等要素。关于“知识”,从一般意义上讲是指人们在解释和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确定性、系统性、完整性的认识与经验的总和^[32],是一个随着人类认识的深入而处于动态变化、不断发展、不断丰

富的概念^[33]。关于“知识体系”,《管理科学技术名词》(第一版)将其定义为“描述特定专业知识总和的概括性术语”。基于以上概述,所谓中国自主的档案学知识体系主要是指中国人立足中国实际自主建设的具有原创性、确定性、系统性的中国档案学认识和经验系统,这些认识和经验集中地表现为中国档案学的概念、观点、思想、理论、方法、工具、经验等,涵盖了中国档案学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

1.2 中国自主的档案学知识体系建构迎来机遇

党和国家长期以来对建设、发展、繁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与积极推进,为当前中国自主的档案学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了时代需求和历史机遇。党的十八大以来,繁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和建构自主的知识体系成为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重要战略任务,为中国自主的档案学知识体系建构营造了良好的政策和环境氛围。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2017年5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提出“创新发展哲学社会科学”;2021年3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深入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2022年4月,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提出“努力建设学科布局优、学术根基牢、科研水平高、服务能力强、国际影响大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2022年5月,中央宣传部和教育部印发的《面向2035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要求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2022年9月29日,教育部启动实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建构和高校咨政服务能力提升工程;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

报告提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培育壮大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由此可见,党和国家围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进行如此高强度和高密度的决策部署,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对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目的、思想、方法、路径、价值等作出了重要规定,为中国自主的档案学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了政策保障和发展方向。在党和国家大力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背景下,中国档案学亟需把握时代机遇,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档案学知识体系,彰显中华民族创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思想伟力,在延展学科范式、创新学科方法、生产新思想新理论、增强学术影响力等方面积极作为,这不仅是中国档案学人义不容辞的光荣使命,而且应该成为新征程上中国档案学人的学术自觉。

1.3 中国自主的档案学知识体系建构正当其时

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34]在党对档案工作的坚强领导下,中国档案事业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中国自主的档案学知识体系建构也迎来了发展的春天。2020年6月20日,我国新修订的《档案法》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立法目标,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档案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2021年6月9日,中办和国办印发的《“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指出新一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迫切要求创新档案工作理念、方法、模式,加快全面数字转型和智能升级,提出要依托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等筹建若干个档案事业发展战略智库,并推动档案学科建设。2021年7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对档案工作作出重要批示:“要把蕴含党的初心使命的红色档案保管好、利用好,把新时代党领导人民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历史记录好、留存好,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

务人民群众。”这些政策文件和批示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档案学知识体系建构的背景和意义、形势和任务、范畴与内容,迫切要求档案学研究必须观照时代变化,直面中国问题,聚焦未来发展,深入研究思考档案工作的改革和突破空间,探索新征程档案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在不断总结新鲜经验基础上创造性地开展研究,在服务中国档案事业建设中实现知识体系建构。与此同时,一级学科名称的变化也为档案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带来变化,2022年9月14日教育部公开发布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显示,管理学下设的“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已更名为“信息资源管理”,学科更名打通了文献、数据、大数据、档案、信息、知识等概念体系,极大地丰富了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的学科内涵,为档案学知识体系创新提供了条件。

2 中国档案学知识体系的形成发展与自主建构

2.1 中国档案学知识体系建构的肇始

古今中外知识生产的历史表明,任何一种知识体系的萌生与发展都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现代中国档案学知识体系是伴随着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档案学研究的起步而开始建构的,主要随着当时公文制度改革和机关档案室工作的发展而逐步建立^[29],形成了档案学十三本旧著等研究成果,而以文华图专、私立中国函授档案学校等为代表的档案教育机构的成立和以《史料旬刊》《文献丛编》《行政效率》《文献特刊》等为代表的研究刊物的创办,进一步对档案学知识的生产、交流、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创建档案学科并进行知识体系建构成为学界的重要工作。1952年中央委托中国人民大学开办档案学专业,为中国档案学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托。以吴宝康为代表的档案学人在苏联专家援助的基础

上,通过合理吸收民国时期积累的档案学知识,并结合对中国档案实践的观察、认识、学习、创新,破除了“档案学不是一门独立学科”“档案学是历史学的一门辅助科目”“档案学是一门辅助科目”等争议,推动档案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1956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制定的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把档案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列入其中^[35]。1957年,吴宝康撰文指出,我国在学习苏联档案学理论方面存在机械搬用的教条主义,没有从实际出发,并呼吁接受教训,避免其影响我国档案学的健康发展^[36]。基于此,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为代表的档案学界肩负使命,团结全国档案界,结合中国实际,并主要围绕档案的本质、作用和档案工作的起源,以及档案管理的模式与方法、档案人才培养、档案工作的矛盾和规律、档案室工作与档案馆工作的关系、档案学与档案事业的关系等进行了大量的开创性研究;围绕档案的逻辑起点与概念界定、档案工作的起源及其发展规律、档案管理理论与方法、档案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档案学史与中外档案事业史、档案工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档案馆(室)的性质与任务、文书档案管理、历史档案管理、科技档案管理等主题,围绕档案、档案学、档案工作、档案教育、档案事业等概念,分别回答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等问题,建立了以经验科学为主要特征的档案学知识体系。

2.2 中国档案学知识体系的形成发展

1978年以后,中国档案学在国家的支持下有计划地从经验科学走向理论科学。1978年,吴宝康受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委托主持档案学科学规划,国家档案局为此成立档案学规划小组起草《档案学八年(1978—1985年)规划的初步设想》(草稿)。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提出要加强档案学研究,为档案学建设提供了政策支持。从1983年国家档案局印发《一九八三年至一九九〇年档案事业发展规划》

起,历次发布的档案事业发展规划中,均对档案学研究作出规定,为中国档案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

受党和国家政策的鼓舞,更加自主和自觉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成为中国档案学人的普遍追求。正如吴宝康在1986年所说:“以社会主义档案事业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档案学的发展,必将成为我国档案学发展趋势的总特点。”^[37]经过档案界的集体努力,我国档案学在1989年就已发展成为具有系列分支学科的群体结构性的科学,并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学科体系^[38]。从1978年起,设置档案学专业的高等教育院校逐渐增多,档案学高等教育院校实现了从一到多的飞跃性变化,档案学学科体系建设也日益丰富;中国档案学会及各专业委员会、全国各地各行业档案学会和各高校档案研究机构相继成立,档案学研究平台日益丰富;中国档案学界开始参与国际档案活动,并在1997年成功举办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在国际档案舞台上日益活跃,越来越多的中国档案学者在国际档案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广泛参与国际档案学研究和交流活动,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学者自主撰写和编写的一系列教材与著作,如《档案学概论》《中国档案事业史》《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科技档案管理学》《文件运动规律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档案学分册》《档案学辞典》《当代中国档案学文库》《档案价值论》《档案文化论》《电子文件管理国家战略》陆续出版,中国档案学思想和理论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档案学创新实现了空前的繁荣。

随着国家对学科的调整与优化,档案学从历史学科门类跨入到管理学门类,涌现出了一系列涵盖档案学基础理论、档案史学、应用理论、应用技术、交叉和边缘性研究的学术成果,并逐步建立了以理论档案学、应用档案学、档案管理技术为主体的学科体系与知识体系,形成了更加契合中国档案实践需要和关切时代发展

变化的档案学知识。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主要围绕档案的本质属性、档案价值与作用、全宗理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与文件连续体理论、科技档案管理、专门档案管理、文件与档案管理一体化、档案开放、档案保护与管理、档案馆建设、档案事业发展、档案管理体制改革的档案法规政策建设等问题,形成了以档案管理为核心的档案学知识体系;二是主要围绕档案信息资源管理与开发、档案信息化建设、电子文件管理、档案管理现代化等领域,形成了以档案信息管理理论为核心的档案学知识体系;三是围绕档案学高等教育建设与发展、教材建设、学科性质、学科体系、研究方法、学术规范与评价等问题,形成了以档案学学科建设和学术体系建设为核心的档案学知识体系。在此阶段,中国档案学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档案学教育和研究体系,积累了丰富的档案学研究成果,实现了档案学知识体系从单一性和零散化向系统化和规模化的转变。

2.3 中国档案学知识体系的自主建构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国家建设发展进入快车道,中国档案学也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中国档案学知识体系的自主建构在理念和行动层面都取得了共识,以体现中国特色、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为核心的档案学知识体系及其叙事系统得以建立并逐渐丰富。第一,不断壮大的档案学学术共同体成为新时代档案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核心主体和力量源泉。截至2021年底,全国开设档案学专业本科教育的高校有35所,开设硕士教育的高校有32所,开设博士教育的高校有20所(含挂靠其他学位点招生);有15所高校的档案学专业被办学所在地认定为省级重点学科或省级优势学科,19所高校的档案学专业入选国家级和省级一流本科专业,档案学教师人数较2013年增加113人^[39]。档案学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为档案学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了人才、资源和科研支撑。据统计,“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期间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中,档案学项目依次为50项、95项、113项^[40],这些科研项目在档案学知识生产中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第二,学科交叉和交叉学科成为档案学知识体系建构的新特点和新趋势。随着国家各项事业建设发展的需要和数字时代的到来与影响,一级学科由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更为信息资源管理,使得档案学科口径大幅扩展,档案学不仅与图书馆学、情报学的交叉日益明显,而且出现了几乎与所有哲学社会科学的交叉与渗透现象,档案与人文、管理、技术的融合交叉进一步加强,不仅催生了数字档案馆、智慧档案馆、计算档案学、档案数据、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红色档案保护与开发等新的研究方向,而且促进了档案学与数字人文的嵌合,从而孕育出新的学科方向。以上这些变化为档案学知识的生产、丰富与传播提供了重要支撑。第三,以数智融合为特点的档案学知识体系正在逐步建立。随着档案学、档案事业、数字时代的互动与影响,我国不仅建立了以纸质档案管理为核心的传统档案学基础理论体系和档案管理方法体系,而且还直面中国问题、紧跟世界前沿、聚焦未来发展,积极对接国家数字化转型升级,丰富和发展了以电子文件为核心的新型档案学理论体系和档案管理体系——电子文件管理理论体系、档案数据治理理论体系。随着数字中国战略的深入推进,档案的概念边界和实务边界不断被突破,档案学观念、思想、理论、方法不断创新,中国档案学界坚持立足档案事业发展实践,不断丰富、创新和发展着档案学科,开辟出一系列富有洞见的档案学研究议题和领域,为建构中国自主的档案学知识体系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丰富的素材。

3 建构中国自主的档案学知识体系的任务与挑战

3.1 建构中国自主的档案学知识体系的任務

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凝练总结中国文明演进、发展成就与经验,破解中国乃至世界

问题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41]基于此,建构中国自主的档案学知识体系的任务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第一,从档案学视角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时代之问、人民之问。要从中国正在经历宏大而独特的实践探索与创新发展中总结中国理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进的现实中提出中国方案,在坚持和践行人民至上的理念与行动中展示中国思想,在中国从追赶时代到引领时代的机遇中贡献中国智慧,把档案学同“四问”相结合,探索档案学在其中的贡献。第二,用理论总结和阐释新时代新征程中国特色档案事业的发展道路与世界意义。中国有自己的档案历史、档案传统、档案文化、档案经验、档案思想,档案学必须有很强烈的现实关怀,关注中国的现实,关注世界的现实,把中国档案事业长期以来在建设和发展中形成的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方向、坚持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基本目标、坚持开放共享与服务发展的明确定位、坚持创新驱动与包容发展的建设路径等,用理论总结好,并面向国际社会进行宣传推广,因为“中国档案知识不仅可以很好地解决中国档案问题,也有其普适性和示范性”^[30]。第三,打造体现中国特色的档案学学术体系。以档案、档案工作、档案现象、档案文化为研究对象,建立起能够体现中华民族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档案学思想体系,提出能够观照中国与观照时代的档案学思想和档案学基础理论,建立起能够融通中外特点和需求的档案学研究方法、工具和理论框架,围绕档案工作难题提出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原創性档案学方法、思想、知识、理论、模式等。第四,建立一套能够揭示和解释档案现象的科学严谨的知识体系和逻辑体系。系统研究和阐释档案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基础术语、基本概念、基本理论、

基本规律、学术评价等,据此能够对中国档案学的发展作出科学的、有说服力的解释与判断。第五,提升中国档案学的国际影响力。中国档案学的发展与演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档案学知识体系建设发展的规律与需求,亟需关注和研究反映中外档案学知识体系的共同点与利益交汇点,通过主持和主导国内外重要档案活动,形成体现中国特点和国际需求的具有公共影响力的学术成果,为解决国际档案界所面临的共同难题提供中国方案。

3.2 建构中国自主的档案学知识体系的挑战

建构中国自主的档案学知识体系是一项复杂且紧迫的系统工程,面临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中国档案学知识体系对我国档案事业发展的解读、阐释、总结亟待加强。我国档案管理历史悠久,从上古结绳记事至今已历经数千年,尤其是自文字产生以来,随着甲骨、金石、简牍、缣帛、纸张、胶片、电子等不同材质和样式的档案载体的发展,以及象形文、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等不同形体和写法的记录,档案承载着中国古代文明,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现代以来,档案工作紧紧围绕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探索管理方法和创新,建立了与国家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档案管理体系。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余年,中国独立自主地建立起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档案事业体系,在管理体制机制层面,确立了“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档案工作的领导”原则,把档案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在管理体系层面,建立了以《档案法》为核心的治档框架,全面推进档案工作“四个体系”建设;在档案信息化建设方面,档案工作实现了从基础设施信息化到档案工作全面数字化转型的跨越,通过省级及以上档案主管部门认证的数字档案馆达307个^[42],创新性地探索了跨地域、跨部门的档案共享平台建设;在档案学高等教育方面,建立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全世界规模最大和体系最完备的

档案学高等教育体系,开创构建了与中国档案实践相结合的档案学学科体系与分支学科,并几乎与哲学社会科学的所有二级学科交叉融合形成了一些具有创新性的交叉学科。然而,从中国档案学知识体系建设现状来看,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优秀档案学思想和成果还没有得到有效挖掘和阐释宣传,目前的档案学知识体系对中国档案实践的解读还远远不够,对当今世界和中国档案工作发生的深刻变革尚未形成广为接受的理论解释,用西方档案理论解释中国档案实践的情况依然存在,这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我国自身的档案学理论传统和档案学学术话语特色与优势,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国档案知识体系的认知普遍存在“剪刀差”。在此背景下,中国档案学需要从知识体系建构层面进行一次全面、深刻、系统的反思,这已经成为新时代新征程建设好发展好中国特色档案学无法回避的重大现实问题。

第二,中国档案学知识体系大而不强,档案学知识生产的自主性、原创性、系统性亟待提升。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的实践深化、历史前进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如果不能及时跟进实践发展提出新思想、新理念、新观点、新方案,理论就显得苍白无力。从中国档案学知识体系建设现状来看,一方面,由于我国档案学界过去过分推崇引入外国档案学理论与方法来解释和研究中国档案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本土档案学理论的建构、研究、总结、培育、推广,导致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影响的档案学理论难以产出;另一方面,我国是档案学理论研究大国,拥有全世界最庞大的研究团队,积累了全世界最丰富的档案学研究成果,但是由中国学者自主提出并在国际档案界具有影响力的成果较为欠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并且已经开启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档案事业也进入了历史最好的发展时期。“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31]。在此背景下,档案

学的研究对象、边界、知识结构较以前发生了巨大变化,档案工作的对象、环境、内容也随之变化,国家对档案学科建设的目标和要求进入改革与调整优化期,社会对档案人才的需求和学生对专业与知识的期待更加趋于多元,这意味着时代赋予了档案学知识体系建构更大的成长空间。

4 建构中国自主的档案学知识体系的策略与路径

4.1 观照时代发展,形成自主建构档案学知识体系的自觉

人类知识体系的每一次变迁或转型,都与所处时代的社会形态或文明形态变化相交织^[43]。知识的形成受惠且受制于其身处的社会条件与历史契机,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与发展是由许多因素促成的,但最根本的动力来自时代发展的需要。知识体系是新时代新征程中国理论建设、思想建设、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面,是维护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从纵向和横向全面审视人类历史长河和世界各国的发展样态,任何国家在任何时代都有反映该时期社会特征和国情特征的一套知识体系,尤其是在反映时代精神文明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这一特征就更为显著。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31]立足时代发展需要,解读中国档案实践是我们国家自己的责任,国外理论从产生起就没有考虑中国档案实践,因此也解释不了全部的“中国故事”。尽管“世界通用的档案理论有用,外国经验也有用,但是不够用,有的不适用,我们需要从中国档案实际出发,建构适用于中国需要的档案学知识体系”^[30]。为此,亟需观照时代发展,形成自主建构档案学知识体系的自觉。具体而言,一是积极主动向国际社会阐释中国档案实践的历史、传统和成就,在深挖历史与文化基因方面绵绵用力,关注档案资源内容及其特殊价值,加快建立和丰富能

够充分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特征的档案学知识体系,倾力总结和解读好数千年来中国档案工作积淀的厚重历史、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档案工作的历史、近百年来中国档案学研究的历史、七十多年来新中国档案事业发展的历史,以及当代中国档案工作的丰富实践、深刻变革和创新探索,阐明其中所蕴藏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要用中国体系化的档案学知识和话语讲清楚中国档案学和档案事业巨大成就背后所蕴含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优势,以及对世界档案事业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力求更好地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建立中国档案实践全景式、全局性的立体化形象。二是把握好历史和时代赋予的重大发展机遇。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扣面向未来的国家战略布局和时代需求,明确档案学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定位与作用;围绕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目标与方向,立足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和创新发展现实需要,重视一级学科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更名为信息资源管理后档案学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聚焦档案学学科体系与分支学科建设质量和内涵提升;强化档案学专业高校及其研究人员在档案学学科体系建设中的主体地位与责任,瞄准档案学领域在科技、人才、创新等方面的重大需求和重大问题,坚持争取与档案学学科发展相适应的资源配置;增强“学科危机”意识,尤其是在数字时代要勇于和善于“从鲜活的信息化实践和多样化场景中获取学科提升的原动力,从邻近学科和飞速发展的现代科技中汲取新的知识和能量”^[44],主动适应数字强国战略,服务国家、社会、人民需要,进入与数字战略“共振”“共进”的新阶段;同时加强与之配套的教材建设,超越以西方知识体系为主的学科范式,为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档案学知识体系提供学科支撑。

4.2 坚持以我为主,形成独立自主和开放包容的建构之路

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时代之问、人民

之间,迫切需要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作为支撑。坚持以我为主来建构中国自主的档案学知识体系,并非全盘拒绝外来知识,而是要更好地兼顾独立自主和开放包容,在既有知识体系的基础上更多从中国的需求出发实现中国档案学知识体系守正拓新和继往开来,并由此提升中国档案学知识体系的影响力。档案学知识体系是知识领域的结构化经验和知识集合,在发展的过程中遵循着知识体系生产与创新的演进逻辑,并且具有继承与发展、借鉴与超越的演进规律。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推出具有独创性的研究成果,就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坚持实践的观点、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在实践中认识真理、检验真理、发展真理。”^[31]作为揭示学科本质和发展规律的理论和知识系统,档案学知识体系主要包括概念、思想、理念、原理、观点、理论、学说、知识、学术、方法、工具等,是档案学科根深叶茂和永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对档案学科发展具有引导和规范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档案学研究范式的走向。西方优秀的档案学理论对中国档案学理论建设当然不乏借鉴意义,并在过去对中国档案学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种借鉴需要的是双向的对话和交流,而不是一味地生搬硬套,必须处理好坚持自我和学习外来的关系。从国家建设和学科成长的长远目标来看,中国档案学知识体系要实现新发展新突破,在根本上还是要坚持以我为主,立足中国需要构建我们自己的档案学理论,最终形成能够服务人类社会发展的档案学理论。第一,要通过对中国档案学进行学术归纳和学理阐释,不断增强中国档案学的学术原创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样,“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31]具体而言,就是要阐释中国特色档案学的基本学术范畴、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具体内容是什么,其中有哪些是中国原创性贡献和独创性贡献;总结集中体现中国特色的理论和

方法,避免一旦离开西方学术理论和研究范式就难以顺利开展学术研究的窘境。第二,要重视和发挥档案学人在档案学知识体系建构中的主体性地位和主动性作用。经过多年发展,中国档案事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所肩负的任务都发生了重要变化。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必须要立足中国和观照国际,坚持从新的实践出发,全面深入地加强档案学理论研究工作,解决好当下所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如今,建构中国自主的档案学知识体系在档案学界已经达成共识,但在具体实践中,往往存在大而化之易和具体而微难的尴尬,迫切需要档案学界大功细作,重视和发挥好中国档案学人从事理论研究的主体意识和主观能动性,深刻把握时代的变化,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日新月异的世界,既要从学术体系规划层面加强宏观设计,又要从概念、范畴、术语及具体议题设置等微观层面入手,持之以恒推进学术创新,“揭示一条规律是创新,提出一种学说是创新,阐明一个道理是创新,创造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是创新。”^[31]要根据当前新征程的时代条件,增强档案学知识体系的时代适应性和外部适切性,用中国理论对档案现象作出符合新时代新征程特征的科学剖析与解答。具体而言,面对中国档案学知识体系正在随着档案实践的丰富而表现出理论丛生的现状,以及各种概念、理念、知识层出不穷的趋势,迫切需要中国档案界更新观念,厘清新概念和新理论,对蓬勃发展的中国档案学作出有力的阐释。

4.3 扎根中国大地,努力建构原创性的档案学概念和理论

毫无疑问,每个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都有其独特性。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独特性在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加之我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国情,造就了契合我国实际的学术思想、观点、理论。这种中国特色在档案学知识体系建构层面的根本要求和显著特征,就是中国档案学研究必须在

继承过去近百年沉淀的档案学知识的基础上,不断丰富档案学知识体系,通过其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从当前国际社会的发展变化来看,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形成自己科学合理的话语概念、知识体系和叙事逻辑,那么在国际上就有很大可能丧失话语权,反过来就必定会影响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时,曾引用了拿破仑的一句话:“世上有两种力量:利剑和思想;从长而论,利剑总是败在思想手下。”可见思想的巨大影响力。事实上,构成思想的最小单元是概念,概念代表着思想的方向和价值。打造标识性的原创概念就是要运用新方法新范式,研究如何从中国悠久的档案传统中进行现代化转化,尤其是从中国特色档案学理论研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档案事业的历史与实践中提炼具有标识性、原创性、时代性的关键概念、核心命题。就哲学社会科学而言,一种思想、理论、知识和学说从创立、发展到传播应用,总是需要通过一定的知识形态来塑造和表达出来^[45],中国档案学知识体系建设经过长期的探索与积累,伴随着学科体系的建设走过了话语创建、话语独立、话语自强、话语自信等发展阶段^[29],已具备中国档案概念建设的正确认识和成熟心态。

过去近百年的档案学研究历史深刻表明,中国档案学界已经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见的档案学概念、观点、思想、理论、知识,构筑了中国档案学的理论大厦根基,为全世界档案学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截至2021年底,我国档案学专业在职教师队伍数量约为414人^[39],这些教师构成了打造中国档案学概念的核心力量,同时有效发挥中国档案学会与各委员会,以及各高校研究机构的组织优势、平台优势、体制优势,激活中国档案界本体性和主体性意识,团结学界可以团结的力量,有利于中国档案概念从“概念嫁接”“概念移植”走向“概念生产”“概念传播”。以此为基础,中国档案概念和理论的形成路径,可从两个方面考量。第一,立足传统,

从悠久的中国档案工作实践历史中、从凝结前辈学术思想与创新精神的学术经典中,总结提炼经过时间和实践检验过的、具有独创性和标识性的概念与话语,以及跨越时空贯通历史沉淀下来的档案学知识体系。我国档案事业的未来发展和重大档案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原创性研究成果提供的新理论、新思路和新方案。为此,亟需紧紧围绕中国社会发展现状和档案事业发展态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进行知识体系建构,用中国档案学理论解释中国档案工作实践,用中国档案工作实践深化中国档案学理论,增强档案学知识的内容之实和体系之实,贡献能够经得起时间和实践检验的档案学方法、思想、知识、理论、模式,助力实现中国档案学知识由“他塑”走向“自塑”。第二,需要立足当下,依托国家重大战略和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着的规模巨大且内容丰富的档案工作实践,重点加强战略性、前瞻性、基础性理论研究规划与实践,主动对中国丰富的档案实践现状作出理论性的、科学的解释和说明。可以通过档案研究者与档案管理者对话、中国档案学者与外国档案学者的对话,将中国经验上升为系统的档案学概念体系和知识范式,全力以赴推出在思想深度和理论高度上能够真正代表中国和观照时代的档案学概念,并重视和解决好这些档案学概念、理论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内的适用性问题,为更好地解决全人类所面临的实体档案保护、文献遗产保护与开发、电子文件长期保存、档案与记忆、档案数据治理、档案共享利用等难题给出中国方案,由此将中国档案学的发展优势和综合实力转化为知识优势。

4.4 解决中国问题,推动以人民为中心的档案学知识创新

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种档案学理论,都离不开实践所提供的现实问题、经验土壤和思想空间。中国档案学知识体系是在历史演进中形成的,是在解析时

代问题的学术创造中生成的,是在服务人民群众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时代课题和人民需要就是理论创新的驱动力。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产生这些体系的时代的需要。”^[46] 新征程国家治理和档案工作的丰富实践构成了档案学理论研究的“源头活水”,档案学知识体系建构必然大有可为。当前中国已经形成了一支规模不断扩大、水平不断提升的档案学理论研究队伍,形成了档案学理论深入参与档案实践和支持档案实践的研究传统。如今,在面对建设规模巨大、发展样态丰富、实践问题丛生、创新潜力旺盛的中国档案实践,面对形形色色的档案现象,必须通过科学研究准确回答我国档案工作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使我国丰富的档案工作实践经验得到理论上的反映,使档案工作中的大量实际问题得到理论上的解释”^[47]。

基于此,第一,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中国理论的逻辑起点是中国问题,研究对象是中国样本,中国国情和中国档案工作现实问题构成中国档案学术理论最深厚的基础、最充分的根据。为此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发扬深入调查研究精神,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档案事业发展历史、现实和需求出发,充分认识和把握档案事业的实践和理论研究动态;立足于变化着的档案实践,面对新征程对档案工作提出的各种问题,要善于总结新经验,提出新论断,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坚持理论从档案实践中来和到档案实践中去的原则,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使理论创新有根有据、合情合理,有用、能用、管用,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充分体现现代化学科的先进性和科学性。第二,要坚持为人民做学问的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脱离了人民,哲学社会科学就不会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生命力。”^[31] 为此,档案学人必须要多开展实地调查研究,将自身的研究行为真正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围绕人民群众在追求美好

生活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需要新要求,关注人民群众的档案记忆保存和档案利用需求,瞄准民生服务、诚信社会、乡村振兴、公共安全、科教文卫等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领域,加强与之相关的档案学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研究,用理论解决关乎人民群众生活的“真问题”“新问题”“大问题”,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讲清说深谈透,把人民创造的经验总结提炼升华,围绕人民需要解疑释惑、阐明道理。

4.5 彰显中国之理,解决国际档案学研究面临的共性问题

面对技术发展和时代变迁对档案学的挑战,没有任何一种既有的知识体系能够独善其身。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48] 彰显中国之理,在解决国际档案学研究面临的共性问题中建构中国档案学知识体系,意味着将中国档案学知识传播于社会之中以确立其社会地位。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张维为通过对全球 100 多个国家的实地考察和亲身参与大量国际传播实践,印证了中国学人的研究成果可以通过有效传播产生较强的社会影响和国际影响^[49]。中国档案学作为一门揭示中国档案现象与档案规律的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已经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建构中国档案学知识体系必须要做到开眼看世界,兼顾和处理档案学话语的传统与现代、国内与国际、网上与网下、大众与小众等关系,要随着新时代新征程经济社会发展和思想文化环境的变化,形成具有时代特点的知识体系。

基于此,第一,综合国际和国内两个因素,研究档案学知识生成特点和档案学话语的传播规律,通过设立海外中国档案学术研究中心、加强中外档案智库交流、牵头组织跨国研究项目等,驰而不息着力打造代表中国立场并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并通过“有组织、有计划地整理、编纂、翻译和宣传中国的优秀档案学成果和理论”^[28],打

破有“理”说不出和说了传不开的困境。第二,围绕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提出的档案学理论和实践课题,善于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出发,研究解决中国和世界面临的共同档案学课题,如档案数据治理、文件档案管理的数字转型、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电子文件长期保存、数字记忆、档案与数字人文等,提升档案学理论的包容性。由于中国档案学规模庞大,所呈现的一系列问题具有多样性、复杂性等特点,解答这些档案课题本身就具有世界意义,解码这些问题的档案学理论创造必定也会成为世界级的成果,对推动国际档案学研究具有积极意义。第三,以追求人类共同价值为导向,加快

构建能够互证互识和共存共生的中国档案学叙事体系。具体而言,就是以文明交流互鉴为原则,围绕档案领域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积极主导和参与开展各种形式的档案工作研讨会、学术交流活动和国际项目合作等,综合运用语言、文字、图像、音乐等多模态话语建构高质量的叙事模式^[50],让档案学知识体系及其表述方式接地气、有创见、可融通,同时通过主动设置话语议题和深度提供话语内容,将中国档案实践及其问题作为支撑中国档案学知识生产和话语生长的现实基础,将中国档案智慧和方案作为彰显中国档案学知识自信的核心范畴,真正推动中国档案学知识体系及其影响力实现从弱到强的转变。

致谢: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研究专项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图情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编号:19VXK09)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 [1] 梁继红. 中国近代“档案学”词源新考[J]. 档案学通讯, 2010(5): 21-24. (LIANG J H. A new study on the etymology of “archival studies” in modern China[J]. Archives Science Bulletin, 2010(5): 21-24.)
- [2] 程广沛, 刘旭光. 继承·借鉴·创新——近代中国档案学的来源研究[J]. 档案学通讯, 2017(1): 28-32. (CHENG G P, LIU X G. Inheritance, borrowing, and innovation: a study of the sources of modern Chinese archival science[J]. Archives Science Bulletin, 2017(1): 28-32.)
- [3] 闫静. 1949至1966年的中国档案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创建[J]. 档案学通讯, 2018(5): 98-101. (YAN J. Created as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historical research on archives in China, 1949-1966[J]. Archives Science Bulletin, 2018(5): 98-101.)
- [4] 梁继红. 中国历史档案学的建立与发展——兼评秦国经《明清档案学》[J]. 档案学研究, 2017(3): 12-16. (LIANG J H.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historical archives study: comment on historical archives of the *Archival Science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by QIN GuoJing[J]. Archives Science Study, 2017(3): 12-16.)
- [5] 潘玉民. 创新有中国特色的档案编纂学理论[J]. 档案学通讯, 2005(6): 32-35. (PAN Y M. Innovating a theory of archival codific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J]. Archives Science Bulletin, 2005(6): 32-35.)
- [6] 王传宇. 科技档案管理学性质、对象和任务[J]. 档案学通讯, 1981(6): 15-18. (WANG C Y. The nature, object and miss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chives management[J]. Archives Science Bulletin, 1981(6): 15-18.)
- [7] 张美芳. 我国档案保护技术学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思考[J]. 档案学通讯, 2008(1): 68-71. (ZHANG M F. Some thoughts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rchival conservation technics in China[J]. Archives Science Bulletin, 2008(1): 68-71.)
- [8] 赵淑梅. 试论档案保护技术学体系的重新架构[J]. 档案学研究, 2004(4): 51-54. (ZHAO S M. An experimental reframing of the technological system of archival preservation[J]. Archives Science Study, 2004(4): 51-54.)

- [9] 冯惠玲. 数字记忆:文化记忆的数字宫殿[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20,46(3):4-16. (FENG H L. Digital memory:a digital palace for cultural memory[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2020,46(3):4-16.)
- [10] 刘越男,杨建梁,何思源,等. 计算档案学:档案学科的新发展[J]. 图书情报知识,2021,38(3):4-13. (LIU Y N,YANG J L,HE S Y,et al. Computational archival science;the new development of archival science[J]. Documentation,Information & Knowledge,2021,38(3):4-13.)
- [11] 加小双. 档案学与数字人文:档案观的脱节与共生[J]. 图书馆论坛,2019,39(5):10-16. (JIA X S. Archive science and digital humanities;disconnection and commensalism in archive concept[J]. Library Tribune,2019,39(5):10-16.)
- [12] 张卫东,赵焯樨. 数字人文在档案学科应用的反思与前景[J]. 兰台世界,2020(5):22-26,39. (ZHANG W D,ZHAO Y T. Reflections and prospects on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humanities in archival disciplines[J]. Lantai World,2020(5):22-26,39.)
- [13] 周文泓. 新文科背景下我国档案学科的前景展望[J]. 情报资料工作,2021(1):37-41. (ZHOU W H. Prospects of archives subject in Chin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liberal arts[J].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tion Services,2021(1):37-41.)
- [14] 冯惠玲,连志英,曲春梅,等. 回顾与前瞻:“十三五”档案学科发展调查和“十四五”档案学重点研究领域展望[J]. 档案学通讯,2021(1):4-15. (FENG H L,LIAN Z Y,QU C M,et al. Review and prospect;investig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archival science during the “13th Five-Year” period and the research vision of archival science in the “14th Five-Year”[J]. Archives Science Bulletin,2021(1):4-15.)
- [15] 吴宝康. 论档案学与档案事业[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72-131. (WU B K. On archival science and archival undertaking[M]. Nanjing:Nanjing University Press,1988:72-131.)
- [16] 吴宝康. 档案学及其学科体系[J]. 湖南档案,1986(5):6-9. (WU B K. Archival science and its disciplinary system[J]. Hunan Archives,1986(5):6-9.)
- [17] 冯子直. 提高学术研究水平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体系[J]. 北京档案,1985(1):4-6. (FENG Z Z. Improving the level of academic research and developing an archiva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J]. Beijing Archives,1985(1):4-6.)
- [18] 王德俊.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理论——学习曾三同志档案学思想的点滴体会[J]. 档案与建设,1992(2):23-26. (WANG D J. Building a theory of archiv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a little experience of studying comrade ZENG San's thought on archives[J]. Archives & Construction,1992(2):23-26.)
- [19] 朱玉媛. 谈谈中国档案学学科体系及档案学理论体系——兼与宗培岭教授商榷[J]. 档案学通讯,2009(1):7-10. (ZHU Y Y. A discussion on the disciplinary system of Chinese archives an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archives;and a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ZONG Peiling[J]. Archives Science Bulletin,2009(1):7-10.)
- [20] 丁华东,张燕. 论档案学的三大研究取向及其当代发展[J]. 档案学通讯,2019(6):4-10. (DING H D,ZHANG Y. On the three major research orientations in archives and their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J]. Archives Science Bulletin,2019(6):4-10.)
- [21] 宗培岭. 中国特色档案学理论初探[J]. 图书情报知识,2007(4):10-14. (ZONG P L. A preliminary study of archival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J]. Documentation,Information & Knowledge,2007(4):10-14.)
- [22] 张斌. 打造新时代中国档案学派[J]. 档案学通讯,2018(4):1. (ZHANG B. Creating a new era of Chinese archival school[J]. Archives Science Bulletin,2018(4):1.)
- [23] 陶俊,黄新荣. 高被引主题结构与档案学科竞争力[J]. 图书情报工作,2019(16):14-21. (TAO J,HUANG X R. Subject structure of highly cited papers and discipline competitiveness in archives[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2019(16):14-21.)
- [24] 张斌,杨文. 中国特色档案学的发展脉络与演进逻辑[J]. 图书情报知识,2020(5):68-78. (ZHANG B,YANG W. The development trajectory and evolution logic of archival scie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J].

- Documentation, Information & Knowledge, 2020(5):68-78.)
- [25] 张斌,尹鑫. 中国特色档案学基础理论体系的历史发展与当代构建[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21(6):36-49. (ZHANG B, YIN X.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contemporary construction of the framework of fundamental theory of archival scie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21(6):36-49.)
- [26] 尹鑫,张斌. 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档案学学术体系[J]. 图书情报知识, 2021, 38(5):4-14. (YIN X, ZHANG B.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cademic system of archival scie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J]. Documentation, Information & Knowledge, 2021, 38(5):4-14.)
- [27] 张斌,王逸凡. 中国档案学学科结构的演进与发展[J]. 档案学研究, 2021(6):6-12. (ZHANG B, WANG Y F.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ary structure of Chinese archival science[J]. Archives Science Study, 2021(6):6-12.)
- [28] 张斌,杨文. 论新时代中国特色档案学话语体系的构建[J]. 档案学通讯, 2019(5):4-12. (ZHANG B, YANG W.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rchives discours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J]. Archives Science Bulletin, 2019(5):4-12.)
- [29] 杨文,张斌. 再论新时代中国特色档案学话语体系的构建[J]. 图书情报知识, 2022(4):30-42. (YANG W, ZHANG B. Re-discuss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rchival science discours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J]. Documentation, Information & Knowledge, 2022(4):30-42.)
- [30] 冯惠玲. 关于建构中国档案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几点想法[EB/OL]. (2022-11-30)[2022-12-30]. <https://mp.weixin.qq.com/s/DGY9expF4NIUiRejGIQ>. (FENG H L. A few thoughts on constructing an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for Chinese archives [EB/OL]. (2022-11-30)[2022-12-30]. <https://mp.weixin.qq.com/s/DGY9expF4NIUiRejGIQ>.)
- [31]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6-05-19(02). (XI J P. Speech at the symposium o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N]. People's Daily, 2016-05-19(02).)
- [32] 苏玉娟. 大数据知识论研究[M].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21:2. (SU Y J. A study on the theory of big data knowledge[M]. Beijing:Science Press, 2021:2.)
- [33] 王春梅,翟安英,陆珂珂. 知识生产新模式与协同创新中心建设[M].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21:29. (WANG C M, ZHAI A Y, LU K K. New model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M]. Beij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Publishing House, 2021:29.)
- [3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11. (Compilation Bureau of Works of Marx, Engels, Lenin and Stalin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Selected works by Marx and Engels; volume I[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2:11.)
- [35] 七百多位科学家在科学规划委员会召开的座谈会上热烈讨论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N]. 光明日报, 1956-06-12(01). (More than 700 scientists discussed the draft of the 12-yea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planning at the symposium held by the science planning committee[N]. Guangming Daily, 1956-06-12(01).)
- [36] 吴宝康. 努力发展档案学[J]. 档案工作, 1957(2):16-19. (WU B K. Efforts to develop archival science[J]. Archival Work, 1957(2):16-19.)
- [37] 吴宝康. 论新时期档案学与档案事业[M]. 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 1997:17. (WU B K. On archival science and archival undertaking in the new era[M]. Beijing: China Archives Press, 1997:17.)
- [38] 吴宝康. 档案学建设的历史回顾与今后任务[J]. 档案学研究, 1989(3):7-13. (WU B K. Historical review of archival construction and future tasks[J]. Archives Science Study, 1989(3):7-13.)
- [39] 杨文,张斌. 中国档案高等教育发展的现状、问题与策略——基于对37所高校2021年档案学专业建设与发展的调查[J]. 图书情报工作, 2022, 66(18):40-52. (YANG W, ZHANG B. The status quo, problems and strategi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rchives higher education; based on a survey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

- opment of archives majors in 37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2021[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2022, 66(18): 40-52.)
- [40] 周耀林, 张兆阳, 衡倩. 科学基金视域下近十五年我国档案学研究进展[J]. 档案管理, 2022(4): 9-18. (ZHOU Y L, ZHANG Z Y, HENG Q. The progress of archival research in China in the past fifteen year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science foundation[J]. Archives Management, 2022(4): 9-18.)
- [41]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N]. 人民日报, 2022-04-26(01). (Adhere to the Party's leadership, inherit the red genes, take root in the land of China, and walk out a new road to build a world-class universi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N]. People's Daily, 2022-04-26(01).)
- [42] 2021年度全国档案主管部门和档案馆基本情况摘要(二)[EB/OL]. (2022-08-18)[2022-09-18]. <https://www.saac.gov.cn/daj/zhd/202208/b9e2f459b5b1452d8ae83d7f78f51769.shtml>. (Summary of the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national archival authorities and archives in 2021(II)[EB/OL]. (2022-08-18)[2022-09-18]. <https://www.saac.gov.cn/daj/zhd/202208/b9e2f459b5b1452d8ae83d7f78f51769.shtml>.)
- [43] 翟锦程. 中国当代知识体系构建的基础与途径[J]. 中国社会科学, 2022(11): 145-164. (ZHAI J C. The basis and ways of building China's contemporary knowledge system[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22(11): 145-164.)
- [44] 冯惠玲. 以信息资源管理的名义再绘学科蓝图[J]. 信息资源管理学报, 2022(6): 4-10. (FENG H L. Redrawing the blueprint of the discipline in the name of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J]. Journal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2022(6): 4-10.)
- [45]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协调会议办公室. 构建新时代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上册)[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21. (Office of the National Coordination Meeting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Building a discourse system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volume I)[M].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2020: 21.)
- [4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91. (Compilation Bureau of Works of Marx, Engels, Lenin and Stalin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German ideology (excerpt)[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8: 91.)
- [47] 冯子直. 论档案事业[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5: 123. (FENG Z Z. On the archival undertaking[M]. Beijing: China Literature and History Press, 1995: 123.)
- [48]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〇一六年新年贺词[N]. 人民日报, 2016-01-01(01). (President XI Jinping delivered a new year's greeting in 2016[N]. People's Daily, 2016-01-01(01).)
- [49] 张维为. 加快推动知识体系、话语体系和传播能力建设[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1-01-21(04). (ZHANG W W.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system, discourse system and communication capacity[N].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Today, 2021-01-21(04).)
- [50] 葛静深, 翟莉. 以多模态话语传播中国故事[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1-09-07(03). (GE J S, ZHAI L. Spreading China's story with a multimodal discourse[N].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Today, 2021-09-07(03).)

张 斌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文献书画保护与鉴定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档案事业发展研究中心、世界记忆项目北京学术中心教授。北京 100872。

杨 文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师资博士后, 讲师,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事业发展研究中心、世界记忆项目北京学术中心研究员。北京 100872。

(收稿日期: 2023-03-04)